

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

红岩儿女

第三部(1949年以后)

一生都在波涛中

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

上

前 言

一生都在波涛中！——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青年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经历。

一生，两大段；四十年代的波涛，是他们自觉自愿主动投入的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十年代以后，则是他们被动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中颠簸。

有人说，他们是上当受骗的一代，浪费了青春热情的一代，新式唐·吉珂德的一代。

从某些现象来看，这些评语似乎都说出了某种真实。但历史事实和种种因果关系也并不就是这样简单，如此概括这一代人也未必公允。

他们当时是一些感时忧国的知识青年，与一切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对时代特别敏感的心灵。所“忧”所“感”的与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苦难和希望是一致的。他们当年奋不顾身抗争的，既有外来的侵略者，也有继承了秦始皇以来两千年专制传统的暴政。他们满腔热情追求的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一再郑重宣告的目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当时在他们心目中，共产党就是民主的化身，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反动派则是专制的化身；斗争的目的不是以一个党派的专政取代另一个党派的专政，而是从根本上消灭欺压人民的暴政，获得合乎正义的自由——特别是罗斯福倡导并为毛泽东当时所赞扬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他们也喜欢从照片上看着大胡子的和蔼可亲的马克思、恩格斯。就他们的大多数来说，这并不是由于读过马恩的多少著作，只因从一些通俗小册子里得知马恩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精神导师，而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在生产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特别喜欢的是马恩谈到中国前途的时候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成果。如果欧洲的反动分子将来逃奔亚洲，一直到达万里长城，说不定会看到这个堡垒的大门上出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 博爱——他们只恨从那个“前夕”到这样的变革何其姗姗来迟。

他们对专制统治诸天天喊叫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极其反感。当反法西斯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期，蒋介石却在《中国之命运》中不但叫骂

共产主义，而且反对民主阵营的盟友美英等国的自由主义，还狂叫“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这在他们心灵上引起的只是憎恨。他们不愿意接受和迎合权势者宣扬的一套又一套使人们头脑简单化的陈词滥调，不愿意顺着当权者为他们指出的坦途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做帮凶，做顺民。书报检查肆虐，党棍特务横行，更加激发起来他们对人格和人性的重视。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了解了中国人民现实的苦难，知识分子的天良使他们不敢为了个人安逸、安全而忘记自己对社会大众的责任。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斗争。其中自然也包括争取自己的解放。不但要从外来的欺凌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从无所不在的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还要从千秋万代积淀而成的因袭的沉重的闸门下解放出来，从一切束缚、戕害、虐杀人性的有形无形的暴力下解放出来，从愚昧的奴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蛇蝎出没的路。他们面对的是专制统治者的一整套血腥的镇压手段：除了公开的专政机器以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半隐蔽的特务鹰犬，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威胁着他们的是逮捕、监牢、酷刑、枪杀，还有莫名其妙的“失踪”、“自行失足落水”……

当时，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中国共产党是高举民主大旗与专制政权抗衡的主力。要求民主进步的青年，除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埋头读书吗？也很难逃脱毕业就是失业的命运。从事工商企业吗？民族资本处于大半凋零的困境。做公务员吗？只不过是官僚当奴仆。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吗？在那样的社会里，在战争的时代，不仅缺少必要的设备和资料，即使出了成果，能起什么作用？发表也难，生活也没有保障。其中一些人本来是厌恶政党的。促使他们走向共产党的是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从力量对比来说，共产党无疑是弱者。但他们不畏权势，站到了权势者宣称要在几个月内消灭的弱者一边。

抗争与镇压相激荡，浪涛滚滚。专制统治日益腐败，在内战中民生日益凋敝，民心日益背离。民主力量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中日益成长。他们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那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同广大群众在一起，直接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统治者，展开波澜壮阔的斗争。并不只是这些知识青年，而是越来越多人民群众支持以推翻专制政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相号召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很快就打垮了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这并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能够决定的，从根本上说是民心所向，时代潮流所向，也是统治者的专制腐败必然导致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多么

欢欣鼓舞啊！他们当然也知道，贫困落后的中国，要很快改变面貌还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但是，他们相信，革命和战争已经结束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时期即将到来，在政治生活中将充满阳光，自己将能够充分地发挥创造性，为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和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推翻专制腐败的旧政权而献身的那一代知识青年当时不懂得，时空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懂得，合乎人类正义的理想社会，用战争的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暴制暴的结果，常常不免是以暴易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消极后果渐渐暴露出来。当权主政的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封闭的非现代化的意识，而且把武装斗争的思路用到了和平时期。“打天下”的人们最迫切的愿望是“坐”稳“天下”。为此仍然热衷于“阶级斗争”，发动一个又一个“战役”。盛行等级制、官本位，缺乏民主、科学、法治、契约、平等、竞争、效率、信用等现代观念。在城市地下斗争、爱国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主要是受现代化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建国后大都居于被支配地位，以至遭受排斥和打击。他们以赤子之心，向党倾吐心声，却被抓住作为“异己”的罪证。在连绵不绝的种种政治运动中，在“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全面专政”中，他们之中很多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斗争对象。其中一些人的结局极其悲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代人的青春浪费了，他们理想中的目标大部分未能实现。但却很难说他们当初就作了错误的选择。

看起来，这些人在50年代以后的遭遇“有违初衷”。但从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看来，则只能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千多年专制统治延续下来的流毒尚待继续肃清。许多人就是由于继续为“初衷”的实现而尽力的时候遭难的。他们之所以不为秦始皇加斯大林式的集权政治所容，主要因为他们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有个性，有主见，不盲从，不驯服，爱提意见，被认为“不尊重领导”，甚至被认为“妄图篡夺领导权”。

也有个别人追求自由发挥自己所长，放弃了体制内的职务，做了“个体户”。在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都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被认为“无业游民”，被怀疑为“图谋不轨”，被严密看管，肆意欺侮。

他们当年置生死于不顾参加推翻专制统治的斗争，只是怀着自己选定的信念，殉道一般地献身，从未考虑个人将来得到什么样的地位、待遇；但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直到近几年，他们才发现，原来在全国“解放”前夕，来自最高领导的就有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地下党（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部书里记述了有代表性的几十个人的经历，主要是他们在1955年以后二十多年的不幸遭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幸存者有些人还有机会为人民做

了些有益的事情,继续为实现当初的建设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理想而尽心尽力,有些人则在多年苦难中落得一身病,丧失了工作能力。许多同龄人已经像秋叶零落,一个个离开人间。

受苦难的影响和自然的规律所支配,这一代人仍然活着而且还有活力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不能不关怀的是,自己当初为之奋斗的民主、富强、康乐、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至今尚未实现,除了自己以有限的余年力促其有所进展之外,更盼望后来人继续为之努力。“百代都行秦政制”,两千多年专制统治扎下的根子是很深很广的,要一下子完全扫除掉是不现实的。政治改革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但决不能容许停步,更不容许后退。

我们承认,这一代人之中不少人身上有某些根本性的弱点。当年不怕流血牺牲争取民主自由,为什么在后来却容忍了新的专制独裁?当年能够独立思考、张扬个性、保持人格尊严,为什么后来却长期陷入个人迷信的泥淖,做了“驯服工具”?甚至在自己已经被“整”的死去活来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没有觉悟?这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和多种多样的因素。“欲说当年好困惑”,要把几十年间乱纷纷的思路从头理清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且容我们继续反思。

一生都在波涛中。既是生不逢时,也是生逢其时。历史上的承平时代,几代人也不曾经历这一代人经历的这样多惊涛骇浪。这是很大的不幸,也是特有的幸运。一代人遭遇世界、本国和身边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快速变化的风波,起伏不断的波涛带给这些人这么深这么强烈却又这么自相矛盾的感受,可以说旷古未有。这就使得每个渺小的个体,因风浪的冲激而带上时代的明显的痕迹。但愿从这些痕迹折射出来的微光,有助于当代以至后世的人们比较近距离地了解这样的时代和风浪中的一代人,从中引出一些应有的思索,想一想今后应该做些什么,可以怎样做。当然,我们的迷思,也望能够得到切实的指引。如能多多少少得到若干这样的反响,也就不算我们枉费心思了。

【附记】《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从漩流到洪流》分别记述了1939到1945年、1945到1949年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代知识青年的主要事迹,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叙述的主要是几十个人的个案,量体裁衣,规格与前两部有所不同。42篇分为6组。为什么这样分,看了就会大致理解,这里就不做说明了。每组各篇的次序是随机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一生都在波涛中(1949 年以后)

前言

I

- 1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3
——谢韬记叙李慎之和他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燕凌编写)
【附录】李慎之主要著述目录(90 年代及以后)
- 2 “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 33
——四十年代爱国民主运动风云人物袁永熙在在建国后为何多次受难(宋铮编写)
- 3 兄弟三人无一幸免 50
——袁永宝谈自己经历、家庭往事和哥哥袁永辉横遭杀害的冤案(燕凌记录整理)
- 4 满腔热血,一生跌宕 59
——解放滇西立奇功的黄平的经历(周涛、吴仍蕃记述)
【附录】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冤案纪略
- 5 劫后余生的劫后余声 76
——在旧中国、新中国都遭监禁,死里逃生的赵宏才自述血泪人生
- 6 独立思考受难几十年 105
——孟庆远谈在政治运动中的受难、困惑和思考(宋铮访问记述)
- 7 “法律迷”与专制暴政的博弈 128
——赵树民为争取法治而奋斗和受难的漫长岁月(穆广仁记述)
- 8 遗诗遗文诉衷情 139
——贾唯英政治生命复苏后的感怀和对苦难经历的追忆
【附录】王宇光的回忆——《跨越坎坷》
- 9 “革命少爷,少爷革命” 157
——郭海长的特长和他的曲折的人生路(宋铮记述)
- 10 在劫难逃 185
——赵隆侃的性格决定了他为专制体制所不容(宋铮编写)

II

- | | | |
|---|----------------------------------|-----|
| 1 | 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 199 |
| | ——许良英自述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 |
| 2 | 欢乐和悲伤交织的生平 | 230 |
| | ——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 | |
| | 【附录】1, 我的父亲谢家荣 2, 我的童年与少年 | |
| 3 | 思考使人受难, 受难使人思考 | 268 |
| | ——李凌自述在苦难中为民主民生不断求索的经历 | |
| 4 | 风雨同舟六十载 | 291 |
| | ——李凌回忆他和黎勤共同的生活轨迹和心灵波纹 | |
| 5 |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 308 |
| | ——廖伯康追记为如实反映四川饿死一千多万人的严重情况而受难的经过 | |
| 6 | 九死一生忆流年 | 341 |
| | ——张定自述为求真务实而备受苦难的一生 | |
| | 【附录】财主的儿女们为什么献身革命 | |
| 7 | 穿越崎岖坎坷, 回到北大红楼 | 361 |
| | ——叶向忠的苦难经历和他晚年放不下的一桩心事(燕凌编写) | |
| 8 | 为了办晚报受难二十年 | 371 |
| | ——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友游仲文的悲欢(宋琰访问记述) | |
| 9 | 梦寐以求成遗憾 | 385 |
| | ——吴让能自述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欢呼后的失望和自己的坎坷 | |

III

- | | | |
|---|-------------------------------------|-----|
| 1 | 最早彻底否定“文革”而血洒横山的女杰 | 393 |
| | ——陆兰秀在“文革”中期就从理论和实际上揭示了“文革”的罪恶而惨遭杀害 | |
| | 【附录】陆兰秀:《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 | |

- 2 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 413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文革”初期被打死的前前后后(宋琰编写)
【附录】卞仲耘的早年
- 3 跨进革命的“门槛”以后 431
——陈璉,一个献身革命的圣洁的女人的悲剧(宋琰编写)
- 4 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者的悲惨结局 448
——十年浩劫中的死难者李炳泉(刘可兴回忆)
- 5 两种忠诚,多重苦难 457
——革命夫妻刘晴波和陆方的悲剧(宋琰记述)
- 6 汨罗江头觅屈魂 472
——毕生全心全意为革命却遭受革命迫害投江而死的廖意林(燕凌编写)
- 7 一颗报界之星的闪耀和陨落 487
——两篇记述刘克林生平的血泪文字(唐振常、刘自立作)

IV

- 1 从火热的民主革命者到艰辛的“学术个体户” 505
——独立从事科学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周邦立(许良英、黄宗甄记述)
- 2 无以名之的传奇 518
——文学翻译家潘痴云的奇特遭遇(李庆云记述)
【附记】潘痴云是怎样入党的
【附录】潘痴云译作要目
- 3 苦辣酸甜一部书 547
——王火自述《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的曲折历程
- 4 为民主与科学奋战的一生 561
——电子科技专家王一平走过的曲折的路(童式一记述)
- 5 几多壮志,几多悲欢 569
——汽车制造专家支德瑜自述曲折坎坷的生平
- 6 那十年,这二十年:值得深思的对比 592
——冶金专家王宇光自述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的愉快和后来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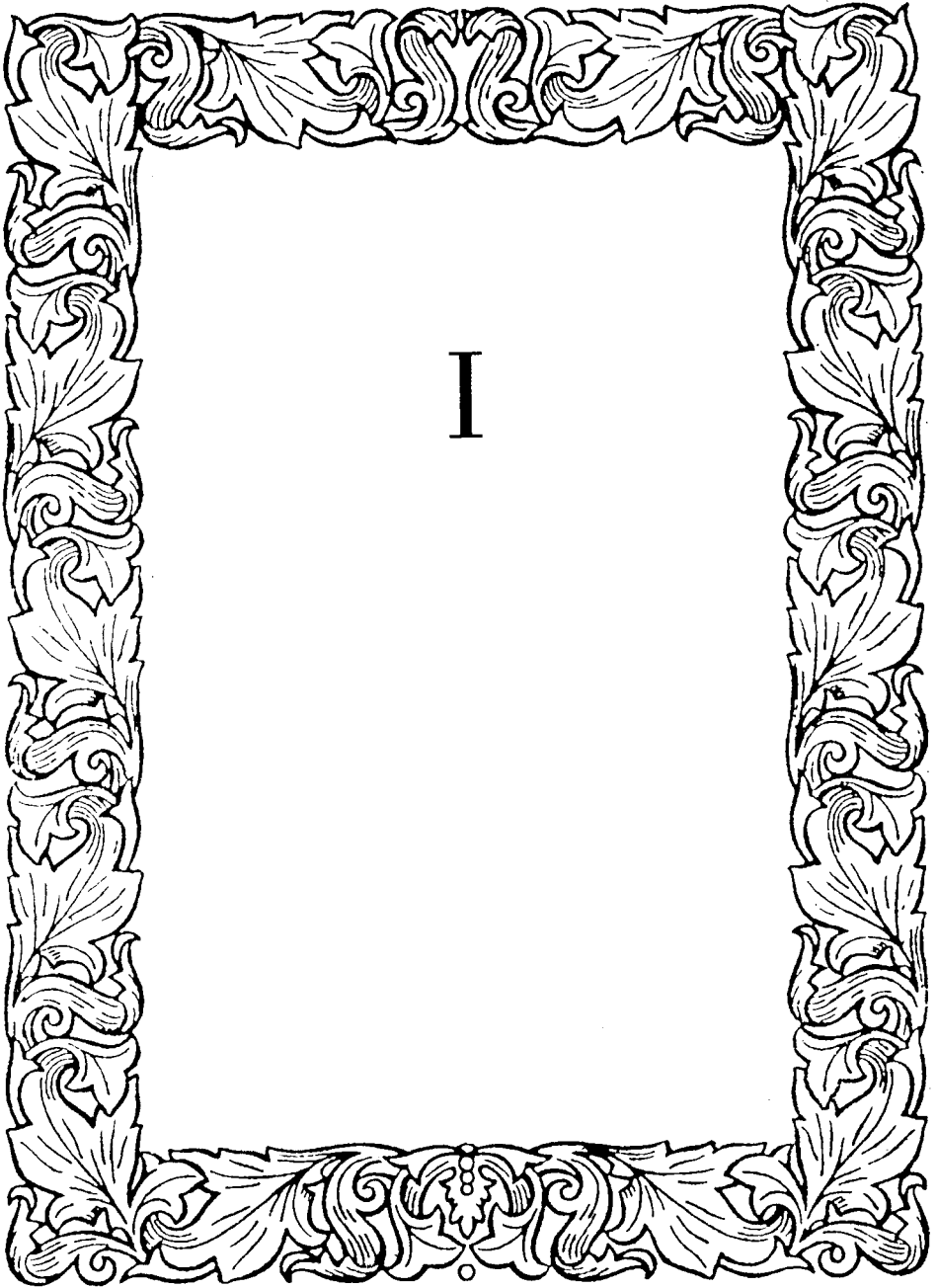
V

- 1 “刀下留人！” 603
——“幸存的烈士”张光明和他的战友们的惨痛旧事(穆广仁记述)
- 2 屡经磨难始恍然 610
——两头红火中途泥泞的杜子才(宋铮访问记述)
- 3 祸兮？福兮？ 624
——童式一舍垢忍辱二十七年之后的反思
- 4 挥泪痛别他眷恋的祖国 638
——爱国华侨知识分子梅振乾如何走向革命而又遭遇不幸(穆广仁记述)
- 5 参加抗战工作却被打成“美国特务” 645
——四十年代的民主斗士康峻后来的苦难人生(梅祖成回忆)
- 6 一个老实人的故事 654
——刘宗孟响应号召到农村去以后的几十年(宋铮访问记述)

VI

- 1 有感于四十年代民主运动中的一代知识分子 665
——马识途 1998 年 7 月 2 日谈话记录
- 2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672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穆广仁集纳)
- 3 不能“回避”的一段历史 679
——1946 年 2 月中国学生“反苏”游行的前前后后(燕凌编写)
- 4 索“革命食子”之根 692
——为哀悼李炳泉等人之惨戮而写(戴煌作)

- 后记 710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谢韬记叙李慎之和他六十年的交往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燕凌编写)

【按】谢韬是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后代，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被反动政府杀害。他从小生活在贫困中。后来一次次受审查，查阶级，查三代，他被认为是“根正苗红”。他对共产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和李慎之是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后来都到了延安中央机关，又大约同时进了北京城。一个在人民大学教马克思主义，一个在新华通讯社负责编发国际新闻和主要供中南海要人阅读的参考资料。50年代，先是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是李慎之被划为“极右分子”。这篇文章，是谢韬对他和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的回忆。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从癸未到癸未，一个“甲子”周期。这大半个世纪是一个大时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我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波涛起伏，既深且巨。我们共荣辱、同浮沉，始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他被打成“极右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我们交往长达六十年的朋友中，而今除我之外，大都已经离开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了。我虽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还想把李慎之想要做而没有做完或没有做成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进行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供后来者借鉴。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早已去世，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守寡养大儿子，把他培养成知识分子，就是李慎之的父亲。他父亲跟钱钟书的父亲是世交，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

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自己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汉书·司马迁传》）；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礼记·大学》）；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汉书·萧望之传》），“谔谔能昌唯唯亡”（唐·周昙）。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朝，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仍然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成）做职员，兢兢业业，逐步升任经理，成为高级职员。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随父亲迁居富顺县（今自贡市）自流井。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讲她这个兄弟如何如何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和两个同学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起步，心里充满了革命激情。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每次卖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到车耀先办的“努力餐”饭馆去“努力餐”一顿。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看守人员天天打牌、喝酒，来人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就可以同关在里面的人见面。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

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他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他读的古书不少，还曾通读过《资治通鉴》，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就觉得这本小书里有大学问，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因病一年后到北平入学。不料刚刚一百天，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他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借读，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觉得物质的化学变化奇妙有趣，这个瓶子里的东西倒在那个瓶子里，就变出新的东西来。而且金陵大学的化学系很有名，有吸引力。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上海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甚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他还说：“我在大学学铁路建设，你看我现在能干什么，还不是一个‘孔乙己’！中国的社会这样腐败，又大敌当前，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改造了社会，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自然不甘心忍受这种状况，反专制、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日渐高昂。1944年日寇更深入西南，中华民族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

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这种思想的起点和基础,并不只属于任何个人,它是时代的客观的产物,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我们都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古文、现代文、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1944年10

月组织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群众集会),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大后方陷于白色恐怖状态中的第一次公开大型集会,引起轰动。接着,“双十一”(11月11日)举行了全市六千多人参加的反对当局指使警察殴打中学生的示威游行;结果反动当局被迫撤换了成都市市长和警察局长,群情振奋。1945年5月4日,九所大学师生两千多人举行了烛光晚会,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会后大家举起火炬在成都主要街道上大游行。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还曾担任与反动当局对话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称“双十一”为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鼓励学生继续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宣称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有人告诉我们,有个抓人的黑名单,李中和我都名列其中。在共同斗争中遭到共同的患难,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成生死之交。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中共党组织对我们十分关心,既支持我们参加民主运动,而又关怀我们的安危。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傅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后来任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影响。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

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那时候,李中就教全校的“公民”课,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还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我教地理、历史,还在上音乐课的大教室开设哲学课,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高尔基的作品,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学生们经常到我们俩的宿舍谈论时事,特别是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专制统治者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传到自贡的时候,学生十分忿怒,在壁报上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

这些又引起专制当局的特务的注意,他们故意露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威胁我们。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们俩离开自贡。我们俩商量后,决定抢在特务动手之前秘密出走。这半年多,蜀光中学学生们的纯真、热情,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中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天还同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向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党员陈鼎文汇报了在蜀光中学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认定,我们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的理想,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只图痛快,不谨慎,不踏实,结果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样,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引,而且有了为民主自由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再担心被特务秘密逮捕了。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